

丽堂皇。此外，民间宴饮用具以陶瓷器为主，上层社会则以漆器、瓷器及金银玉石为主，铜器仍有但已少见。随着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，异域器具如车渠、琉璃等新材料的食饮器，受到贵族追捧。

一、陶瓷类饮食器具

曹魏时饮食器基本承袭东汉，西晋的陶质饮食器，以罐、壶、尊、盘、碗、耳杯、勺、甑、釜等为主，翻口罐、多子栺为具有时代特征的食器。南方陶瓷业发展迅速，浙江上虞窑口分布密集。上虞是越州辖地，故称为越窑，建于东汉，是瓷器的发源地，烧制的瓷质饮食器具有胎质细腻、坚硬、胎釉牢固、釉色纯净、薄厚均匀等优点。此后，瓷器逐渐摆脱陶器影响，胎薄而釉色晶莹，成为当时社会的新风尚。以动物形象为轮廓或作局部装饰的鸡首罐、鸡首壶、羊尊等，造型

生动，富有生活情趣，受到名门望族的喜爱。

西晋青瓷碗常见。西晋的碗多敞口，弧腹，平底或假圈足，有的内饰花纹；盘为圆唇，斜壁，平底内凹。空柱盘为敞口，方唇，弧腹，圈底内凹，底部中央起圆柱，柱中空，柱口呈喇叭形。图3-31是典型的越窑青瓷小碗，高3.9厘米，口径8.4厘米，底径4.7厘米，造型简约。

1. 具有时代特征的盛食器栺流行。此时栺多陶瓷制品，少数为漆质。栺是越式食器，扁圆形盒，盒中以隔梁分成若干小格，统称格盒，若无盖则成格盘。图3-32是西晋越



图 3-31 西晋越窑青瓷小碗（浙江省博物馆藏）



图 3-32 西晋越窑青瓷格盘（浙江省博物馆藏）

窑青瓷格盘，高4.5厘米，口径21.3厘米，底径21.6厘米，颇有特色。考古发现，三国时吴墓中出土的榻数量大增，不仅有圆形的，还有方形的。1974年，江西南昌晋墓考古出土的长方形漆榻，因底书“吴氏榻”而命名。文献中榻正式名称为“櫟”，《世说新语校笺》引《玉篇》云：“扁榼谓之櫟。”^①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记：“（罗友）在益州，语儿云：‘我有五百人食器。’家中大惊。其由来清，而忽有此物，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櫟。”^②其内小格称为“子”，分成多少格，就称为几子櫟。长方形榻较为常见，内分一大格八小格或六小格，初期是平底，稍后变为方圈足，足壁下部切割出花座。

2. 酒器中鸽形青瓷较为常见。图3-33是西晋鸽形青瓷杯，杯体呈圆形钵状，直口无稍敛，微鼓腹，底内凹。器身高4厘米，口径10.5厘米，底径5.5厘米，器内底饰多组同心凹弦纹，外壁上腹部划两道凹弦纹，一侧是昂首展翅的鸽子，另一侧是宽而上翘的鸽尾作柄，生动活泼，稚趣可爱。鸽子很早就被人类驯化，更因“飞鸽传书”受到人们喜爱，成为吉祥之鸟。东汉至西晋，越窑瓷器中多有鸽子器形，寄托着人们祈求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。



图 3-33 西晋越窑青瓷鸽形杯（浙江省博物馆藏）

①（南朝宋）刘义庆撰，（梁）刘孝标注，杨勇校笺：《世说新语校笺》中《雅量第六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319页。

②（南朝宋）刘义庆撰，（梁）刘孝标注，杨勇校笺：《世说新语校笺》下《任诞第二十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678页。

3. 西晋青瓷出现了鸡首壶、扁壶等新器形。鸡首壶以壶嘴做成鸡首状而得名,用以满足人们祈求吉祥的心理愿望。鸡首壶是在东汉盘口壶基础上创新的品种,最早出现于三国、西晋之交的南方地区,后传入北朝,流行至唐初,多为瓷器,胎质与汉朝、三国相比显得细腻,体薄精巧。另有些许釉陶器。鸡首壶造型为盘口,细颈,鼓腹,平底,肩部有鸡头状的流,对应的柄侧饰以鸡尾。西晋时,鸡首壶从无柄发展为圆环形柄,器形以小件为主,肩部一侧为鸡头,鸡头短小无颈,另一侧的尾部相应短小。鸡首壶盘口直径较大且浅,腹部较圆,鸡头虽神情毕肖,但不能倾注,头与尾纯粹是装饰品,没有实用意义。学界认为鸡首壶为茶器或酒器,寓意“吉祥”。西晋鸡首壶处于早期阶段,器形特征是较为矮小,风格朴素显拙,装饰简略。东晋,鸡首壶由低矮走向高大,实用性大大增强,鸡形刻画更为生动,做工更显精致,处于发展变化的过渡期。东晋鸡首壶在墓葬中常见。

魏晋南北朝,鸡首壶的演变过程,呈现出壶体由低到高,把手、口由不通到通,鸡头由小到大,由无颈到有颈,手柄由无到有、由短变长呈龙形的过程,其演变过程如图3-34所示。^①南北朝时佛教盛行,纹饰中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莲花纹、忍冬纹,器表釉彩由青釉到以青釉为底、褐斑点彩,自东汉出现的黑釉得到发展,功能由单纯装饰到装饰与实用兼具等。北朝的鸡首壶在器形、纹饰等方面与南朝的差别较大,体现在器形更高、口径增大、宗教纹饰、厚重质朴、异域风采等。随着北朝鲜卑人汉化影响的深入,鸡首壶器形更加注重外观美化,唐中后



图 3-34 鸡首壶概略演变图示

① 任静:《北朝三种酒器特色探析》,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3年。

期后，鸡首壶多用以装饰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东吴西晋流行的瓷质扁壶酒器，仿青铜器烧造，扁圆腹，高圈足或两侧高足，器腹两侧对称双系，便于系绳背挂。图3-35是三国东吴时期的青釉瓷扁壶，口沿6.3厘米，腹宽21厘米，通高23.2厘米，器形典型，便于携带。1983年，江苏南京长岗村吴末晋初墓出土的青瓷釉下彩带盖盘口壶，如图3-36所示，盘口，细颈，鼓腹，有系，平底，圆弧形盖，盖钮雕成回首卧鸟状，器高32.1厘米。此器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釉下彩瓷器，说明我国早在三国时，就已发明和掌握了釉下彩的制瓷技术。



图 3-35 三国吴青釉瓷扁壶（镇江博物馆藏）

4. 魁状类盛物或盛酒器的持柄已简化成弯曲的小柄状。南京西善桥官山南朝墓的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砖拼壁画中，见图3-37，阮籍、山涛和王戎面前均放一带曲状小柄的魁，人物手中还举着小圈足耳杯。画中人为山涛，手持饮酒器杯。魏晋士人，豪饮时不限于杯、碗，《晋书·阮咸传》记载：“诸阮皆饮酒，咸至，宗人间共集，不复用杯觞斟酌，以大盆盛酒，圆坐相向，大酌更饮。时有群豕来饮其酒，咸直接去其上，便共饮之。”^①



图 3-36 三国吴青瓷釉下彩盘口壶（南京六朝博物馆藏）

^①（唐）房玄龄等撰：《晋书》卷四十九《列传第十九·阮籍·阮咸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1363页。



图 3-37 南朝墓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砖拼壁画·山涛像（局部）（南京博物院藏）

二、漆木类饮食器具

东汉中期以后，由于政治动乱，漆器的地位已然下降，瓷器转而兴起。三国西晋时期，南方地区的漆木器仍沿袭汉代的传统造型，色彩多为内朱表墨，漆奭流行。在案、奭、盒和盘上绘有装饰图案和精美的漆画，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画面大量出现，此外有流畅生动的鱼水图案、云气及回曲连续的植物纹图案，在注重写实的同时，更加流畅活泼，富于情趣，与汉代风格迥异。三国时的漆器以东吴为主，南北朝时期的漆器则以北魏为主，漆器向多样化和实用化方向发展，漆器的镶嵌和彩绘技术更加成熟。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器代表了东吴的漆器发展水平，种类也多，除了常见的耳杯、奭、盘、盒等器形，还有凭几、砚等新器形。其中一款凭几呈曲面，下设三蹄足，始于三国，流行于两晋南北朝，新颖别致。安徽宣城出土的西晋漆木器，种类有奭、盘、碗、耳杯、勺、盒等日用饮食器，制作工艺简单，多无纹饰。^①

三、铜、玉石饮食器具

此时生活用具以陶瓷、漆器为主，铜质器物虽有但已少见，制作也较粗糙，以素面为主，类别主要有铜洗、铜双耳釜、铜耳杯、铜鑊壶、铜鑊斗、铜碗、铜

^① 黄胜桥：《宣城出土的西晋漆木器》，《美与时代（上旬）》2014年第8期。

钵等。湖北鄂城一口古井中出土了“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八十枚”铭的双耳铜罐，高20厘米，口径12.8厘米，如图3-38所示，腹上有“武昌”和“官”两处铭文，表明东吴曾在武昌设有官府控制的铸铜作坊，生产实用器物，仅罐的数量即有数千。铜罐体表无装饰，只是腹下有均匀的制作时留下的细密旋纹；靠近罐底处还有破损后以生铁铸补的补丁，表明实用铜器得之不易才修补再用，同时又可看到此时铜器重实用，装饰简朴。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物中仅有四件铜器：三足盆炉、熨斗、水注和鸡首觥，温酒器觥壶仍是沿袭汉代传统。



图 3-38 三国吴青铜铭文罐
(湖北鄂州博物馆藏)

汉代传统的玉容器此时仍旧摆在官宦权贵家的案几之上。河南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收藏的三国魏的玉酒杯，高13厘米，口径5厘米，见图3-39，由温润洁白的和田玉雕琢而成，白色中泛青，圆筒形杯身，束柄，下有圆饼形高足，通体光素无纹。其器形规整，曲线流畅，光洁细腻，凝玉润脂，富有汉代遗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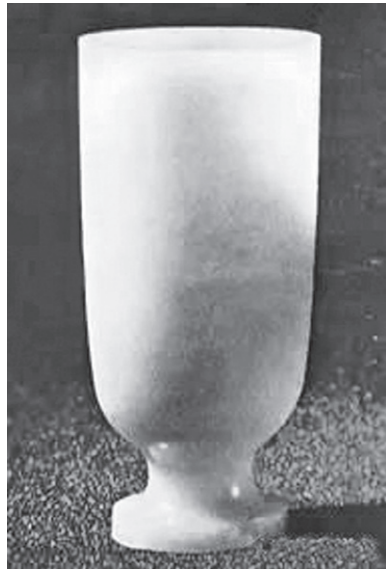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39 三国魏玉杯(河南洛阳
文物工作队藏)

随着民俗的渐进和东西贸易的发展，饮食器物也逐渐丰富起来，出现了异域及不同于以往材质的器皿。曹植的《车渠碗赋》名闻遐迩：“何明丽之可悦，起群宝而特章。俟君子之闲宴，酌甘醴于斯觞。既娱情而可贵，故求御而不忘。”^①车渠是一种来自西域的宝石，纹理细腻柔和，颜色明快艳丽，无比珍贵，斟满美酒，欢乐娱情，饮之令人开怀。

① (清)严可均编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之《全三国文》卷十四《陈王植·车渠碗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1128页。

四、异域的玻璃类珍品

来自西域的玻璃制品成为新鲜的奢侈品。从汉代开始，随着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，中亚与西亚的玻璃制品作为昂贵的进口货运抵中国，成为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标志。汉代就有与西域贸易而来的琉璃，《汉书·西域传》云：“（罽宾国）出封牛、水牛、象、大狗、沐猴、孔爵、珠玕、珊瑚、虎魄、璧流离。”^①此外，《魏略·西戎传》载：“（大秦）出赤、白、黑、绿、黄、青、紺、缥、红、紫十种流离（琉璃）。 ”^②这些来自异域的稀罕器物，成为时人新宠，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记载：“王公（导）与朝士共饮酒，举琉璃碗谓伯仁（周顗）曰：‘此碗腹殊空，谓之宝器，何邪？’答曰：‘此碗英英，诚为清澈，所以为宝耳。’ ”^③盛放美酒的琉璃碗清澈、英英，说明透明度好，更能彰显酒液的光泽。《世说新语·汰侈篇》记，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，“武子供馔，悉用琉璃器”^④。《晋书·崔洪传》记载：“汝南王亮常宴公卿，以琉璃钟行酒。酒及洪，洪不执。”^⑤崔洪反对奢侈，不用琉璃钟。晋人潘尼的《琉璃碗赋》则具体介绍，这些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万里远来的琉璃器皿，具有“凝霜不足方其洁，澄水不能喻其清”^⑥的特点，清澈透明，与本土的五色玉迥然不同，成为当时特别新鲜受宠的宝贝。外来琉璃器造型充满异域风格，晋代廉吏兼诤臣傅咸《污卮赋》记载：“人有遗余琉璃卮者，小儿窃弄，堕之不洁……逞异域之殊形。”^⑦此语感叹晶莹剔透的宝物

①（汉）班固撰，（唐）颜师古注：《汉书》卷九十六上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·罽宾国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3885页。

②余太山撰：《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》五《〈魏略·西戎传〉要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第348页。

③（南朝宋）刘义庆撰，（梁）刘孝标注，杨勇校笺：《世说新语校笺》下《排调第二十五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710页。

④（南朝宋）刘义庆撰，（梁）刘孝标注，杨勇校笺：《世说新语校笺》下《汰侈第三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786页。

⑤（唐）房玄龄等撰：《晋书》卷四十五《列传第十五·崔洪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1288页。

⑥（清）严可均编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之《全晋文》卷九十四《潘尼·琉璃碗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2000页。

⑦（清）严可均编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之《全晋文》卷五十一《傅咸·污卮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1753页。

掉入污秽处，不如普通酒器，也用以隐喻不要同流合污。此后，异域琉璃不断东来，《魏书·西域传》云：“波斯国……土地平正，出金、银、镠石、珊瑚、琥珀、车渠、马脑，多大真珠、颇梨（玻璃）、琉璃、水精、瑟瑟、金刚、火齐……”^①

来自异域的琉璃颜色鲜亮，色泽透明，光彩照人，受到时人钟爱，其成分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玻璃。为便于区分，来自西方的透明光泽器皿称琉璃。中国古代也生产玻璃，但不透明，主要用于仿玉。据《广雅》《韵集》记载，相当长的时间内，“琉璃”是作为火烧的玻璃质珠子和其他一些透明物质的统称。现代专家根据光谱鉴定，中国本土的玻璃是“铅钡玻璃”，与西方琉璃的“钠钙玻璃”不同，是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。中国古代玻璃器制作一直追求“真玉”境界，器物不进行“退火”处理，遇高温易裂，所以本土的铅钡玻璃不适合于宴饮场合，常用作各种装饰、礼器和随葬用品，来自西域的琉璃制品因不易爆裂而备受珍视。

五、文人的雅致饮具

魏晋时期，曲水流觞兴起，文人雅士喜好碧筒饮。所谓碧筒饮，也叫“碧筒杯”，是采摘刚冒出水面、卷拢如盏的新鲜荷叶盛酒而饮，用来盛酒的荷叶，称为“荷杯”、“荷盏”或“碧筒杯”，因为茎管弯曲状若象鼻，故有“象鼻杯”之称。据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：“历城北有使君林，魏正始中，郑公愬三伏之际，每率宾僚避暑于此。取大莲叶，置砚格上。盛酒三升，以簪刺叶，令与柄通，屈茎上轮菌如象鼻，传喻之，名为‘碧筒杯’。历下敦之，言酒味杂莲气香，冷胜于水。”^②三伏天郑愬与幕僚门客在历城（济南）使君林避暑，以簪刺透新鲜莲叶叶柄，使莲叶和莲茎贯通，弯曲莲茎成象鼻状，内置美酒，名曰“碧筒杯”。“酒味杂莲气香，冷胜于水”，酒味与莲气混合在一起，更有一番情趣，是文人雅士盛夏消暑的清凉方式，以文人审美的眼光达到避暑和助饮作用。“碧筒饮”始于魏晋时期，兴盛于唐宋时期，在文人雅士的推崇倡导下，民间也颇流行。唐宋之后有铜、瓷、金等不同质地的碧筒酒杯，富有艺术陶冶的文化气息。从曹魏开始，文人雅士的

^①（北齐）魏收撰：《魏书》卷一百二《列传第九十·西域·波斯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2270页。

^②（唐）段成式撰，许逸民校笺：《酉阳杂俎校笺》前集卷七《酒食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5年，第565页。

游宴兴趣增高，他们尝试新的事物，游山玩水之际对宴饮的物质要求降低，更注重山水自然间不可言说的意境情趣，即后来欧阳修所说的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追求超越口腹之欲的精神愉悦。

三国魏晋，游宴兴起，文人雅士开辟了新的饮宴方式，碧筒饮充满了自然气息与风雅氛围，为唐宋衍生出碧筒杯、荷杯、荷盏、象鼻杯等酒具奠定了基础。制瓷业继续发展，釉下彩技术的出现，奠定了瓷器在东晋南北朝饮宴器具中的主流地位。鸡首壶、扁壶等新器形的出现和演变，兼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，体现了民族融合和南北文化的交流。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和交流，异域的珍稀宴饮器争奇斗艳。本土金银玉石宴饮器具富丽堂皇，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。外来器具带动了本土烧造技术的进步。

第三节 东晋南朝的饮食器具

从东晋开始，南方地区的饮食器具中，瓷器普遍使用，成为青瓷发展的第一高峰期，陶器退出主要地位，成为大众百姓随葬用品的主要器物。除青瓷外，南朝黑瓷得到发展，丰富了瓷器种类。瓷器上的纹饰，受佛教思想的影响，多饰以莲花纹、忍冬纹等，造型更注重实用性。漆器衰败，花纹趋简，不复汉时荣光。金银玉石器具仍是权贵富豪的专用品，新型茶具发展很快，逐渐从饮食器中脱离出来。

一、陶瓷饮食器具

东晋开始，青瓷饮食器具广泛出现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。青瓷釉面光滑，呈淡青、青绿等色，常见的器类有碗、盘、钵、罐、盘口壶、鸡头壶、盏托、盒、唾壶等，不少器物配有器盖，碗大小配套，盏有托盘。东晋时期，青瓷的造型趋于实用性，装饰简洁。

（一）食器

常见的食器有盘和罐。此时高足盘流行，器形有大、中、小之分，形式为浅盘式，口沿外展，盘心平坦，下承喇叭状高圈足。图3-40是南朝青釉莲纹高足盘，盘弧形腹稍浅，口微敛，内底心微凸，喇叭形足稍高，足端微外卷。盘体釉

色黄绿，釉面光滑滋润，略有厚薄不匀之感。高足盘由青铜豆发展、演变而来，此时的高足盘，造型简练、朴实无华，为宴饮常用品，隋代盛行的高足盘就是在南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。碗、钵变化也是同样的演变规律。早期碗口大底小，造型矮胖，以后碗壁增高，底部放大。东晋大碗、盘类器物的口沿、器心和外壁多饰彩斑，或作散点式，或连缀成简单图案。南朝时的碗型与现在的碗相似，器壁变薄，腹部加深，器底较厚，多数为假圈足。圆饼形足的形式更普遍。



图 3-40 南朝青釉莲纹高足盘（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藏）

东晋时期贮盛各种食物的青瓷罐，体形逐渐往高里发展，器体不断加高，容量增大；造形方面上腹收小，重心向下，稳定性增强，更加实用。

（二）酒器

南朝时黑瓷兴起并发展，釉层丰厚，釉面滋润，色黑如漆，可与漆器相媲美，装饰手法简洁，仅有弦纹和冰裂纹饰，冰裂大若蟹爪，小若碎珠，均匀自然，和谐悦目。南朝时期受佛教思想影响，盛行莲花纹饰，如碗、盏、钵、壶的外壁常饰以重线仰莲瓣，盘心周饰莲瓣，整个器形宛若盛开的莲花。

酒器中主要有壶、尊、勺、杯等器具。壶中单柄壶、鸡首壶、羊首壶等常用器形最为多见，形态从秀美向实用发展。

1. 单柄壶。图3-41是南朝青釉刻花单柄壶，高21.3厘米，口径11厘米，足径12.4厘米，底径10.8厘米。壶体饱满、浑圆。胎体厚重，呈灰白色。内外均施青釉，釉色青绿，釉厚处透明，玻璃质感强。该壶身纹饰分3组，肩部及腹下刻仰覆莲瓣各一周，两层莲瓣间刻忍冬纹，每层纹饰之间隔以弦纹。纹饰层次清晰，



图 3-41 南朝青釉刻花单柄壶（故宫博物院藏）

线条简洁、明快、流畅。该壶造型袭西晋式样，并有较大改进，增强了装饰效果，提高了实用价值，是研究壶形演变的重要文物，堪称南朝青瓷的代表作品。南方和北方所烧青瓷各具特色。南方青瓷，一般胎质坚硬细腻，呈淡灰色，釉色晶莹纯净，有类冰似玉之感。北方青瓷胎体厚重，玻璃质感强，流动性大，釉面有细密开片，釉色青中泛黄。

2. 鸡首壶。鸡首壶壶身略变大而高，鸡颈增高，鸡冠加高，鸡头也扬起远眺，且与壶身相通。相对一侧的鸡尾变为圆鼓形曲柄，起于器肩部，柄上端直接黏接于盘口，并稍高于壶口。肩部两侧置条形系，讲究实用与完美的结合。东晋中晚期，柄上端多雕成龙头衔盘口，有的双系平削成桥形。南朝时器身更为修长，颈瘦长，鸡头高瘦挺拔，有的为双鸡头。壶柄高翘卷曲，肩部呈对称的桥形系，大平底，形态向秀美与实用方向演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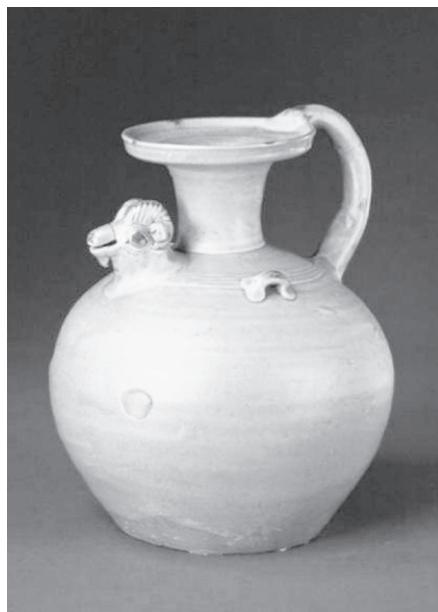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-42 东晋青釉褐斑羊首壶（故宫博物院藏）

3. 羊首壶。晋朝时期的青瓷壶，动物造型的壶较多，除了鸡头、羊头流行，还有虎头、鹰头等。图3-42是东晋青釉褐斑羊首壶，高23.8厘米，口径10.8厘米，底径10.8厘米。壶口浅盘状，细颈，球形腹，平底。肩部一侧有羊头形流，相对一侧安曲柄。壶体施青绿色釉，在壶口沿、羊头及系上均点涂褐斑。肩部有二道暗弦纹。壶头羊口微张，颌下一络胡须，双角向后弯曲，双目外凸，双睛点涂褐彩，颇具神韵。

4. 尊。尊不仅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酒器，有时还赋以一定政治功能。《宋书·礼志一》记载：“正旦元会，设白虎樽于殿庭。樽盖上施白虎，若有能献直言者，则发此樽饮酒。”^①设白虎樽意在奖劝直言者。

5. 杯。饮酒器中以耳杯居多，两端稍向上翘，南朝时上翘部分逐渐减少，隋

^①（南朝梁）沈约撰：《宋书》卷十四《志第四·礼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345页。

唐消失。南朝出现新型高足杯，有的承以高足盘。江西文物考古所在南昌小兰南朝墓出土一件青瓷高足盘托杯，如图3-43，通高12.5厘米，杯口径7.5厘米，托盘口径14.0厘米，足径8.0厘米，杯直接套坐于盘中杯足上，杯体可左右转动，是南朝青瓷中难得的珍品。此造型后向东传到日本。

二、漆木及金银、玉石饮食器具

漆质饮食器快速衰落。由于瓷器的广泛应用，南方地区盛行的漆木饮食器数量快速变少，花纹也趋于简单。漆器种类变化不大，有圆盘、托盘、耳杯、攒盒、匕、箸、长方形榻、盒等。

宴乐纹漆盘比较常见，多是卷木胎，圆形，浅腹，平底；外部髹黑漆，口沿饰黑地红彩连珠纹一周，内壁髹红漆，以红、黑、灰绿等色彩绘出由人物、车马、瑞兽组成的宴乐图。漆托盘，旋木胎，斫制，长方形，四边上翘，两侧有长方形耳，平底。盘内髹红、黑漆，双耳及外底髹黑漆，色泽鲜明。漆匕，斫木胎，分斗和柄两部分，斗为椭圆形，平面；长柄为多棱形，至柄首渐细。斗内及柄下端与斗连接处平面髹红漆，柄首以红漆绘宽带纹，其他部位髹黑漆。漆箸，两端皆为红漆宽带纹，中间髹黑漆。漆攒盒，斫木胎，带盖，扇面形，盒内壁髹红漆，外髹黑漆。

金银玉器及外来珍稀饮食器常被权贵豪富用于席间助兴。葛洪《抱朴子·酒戒》：“夫琉璃海螺之器并用，满酌罚余之令遂急。醉而不止，拔辖投井。”^①席间热闹非凡，琉璃海螺器为名贵酒具，斟满杯罚余沥的酒令不停响起，主人热情，为留客不惜拔掉送客的车辖投入井中，一幅金主热情待客图。金银玉石器向来珍贵，与普通百姓无缘。《南齐书·虞愿传》载：“（宋明）帝素能食，尤好逐夷（一



图 3-43 南朝分体青釉高足盘托杯
(江西南昌洪州窑青瓷博物馆藏)

^①（晋）葛洪著，杨明照撰：《抱朴子外篇校笺》卷之二十四《酒诫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1年，第570页。

种甜酱),以银钵盛蜜渍之,一食数钵。”^①用银钵存酱,且一食数钵,看来银钵数量少不了。《南齐书·萧颖胄传》记载:“上慕俭(约),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枪,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。颖胄曰:‘朝廷盛礼,莫过三元。此一器既是旧物,不足为侈。’帝不悦,后预曲宴,银器满席。颖胄曰:‘陛下前欲坏酒枪,恐宜移在此器也。’帝甚有惭色。”^②齐明帝常存节俭之念,预宴时满桌使用银器,宗室大臣萧颖胄劝谏齐明帝,毁坏旧酒枪不若少用银器更为节俭。《南史·何点传》记载,竟陵王萧子良“遗点嵇叔夜酒杯、徐景山酒枪”^③。酒枪是盛酒器。《宋书·张畅传》记载:“孝武又致螺杯杂物,南土所珍。”^④这里的螺杯即鹦鹉螺制作的杯。《后赵书》曰:“石虎子韬,以琉璃爵、螺杯劝客酒。”^⑤北周诗人庾信也有“香螺酌美酒”^⑥诗句。鹦鹉造型的螺杯是酒器,有的还镶金银钿,并已传至北方。由于螺杯杯腔蜿蜒曲,藪穴幽深,喝时不易一饮而尽,又称“九曲螺杯”,用于罚杯助兴。

三、饮茶用具初显专用化

茶叶食用历史悠久,史前时的神农氏就以茶解毒,汉代人在解毒之外亦用于饮用,东晋时期长江流域已流行饮茶,有些人甚至嗜茶成癖。我国饮茶风尚,起于汉之蜀地。西汉辞赋家王褒《僮约》有“烹茶尽具,藪已盖藏”^⑦之说,这是中国最早提到“茶具”的一条记载,说明煎煮茶叶需要一套器具。又有“武阳买

① (南朝梁)萧子显撰:《南齐书》卷五十三《列传第三十四·良政·虞愿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2年,第916页。

② (南朝梁)萧子显撰:《南齐书》卷三十八《列传第十九·萧颖胄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2年,第666页。

③ (唐)李延寿撰:《南史》卷三十《列传第二十·何点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,第788页。

④ (南朝梁)沈约撰:《宋书》卷四十六《列传第六·张邵·张畅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1398页。

⑤ (清)汤球辑,吴振清校注:《三十国春秋·赵书·前燕田融》,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132页。

⑥ (北周)庾信撰,(清)倪璠注,许逸民点校:《庾子山集注》卷之四《诗·园庭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78页。

⑦ 赵逵夫主编:《历代赋评注·汉代卷·僮约》,成都:巴蜀书社,2010年,第226-227页。

茶，杨氏池中担荷”^①，可见茶在汉时作为一种饮料已成为商品。西晋左思的《娇女诗》云：“并心注肴饌，端坐理盘楬……止为茶菽据，吹嘘对鼎铉。”^②此处的“鼎”就是茶具。西晋直言敢谏的司隶校尉、文学家傅咸说：“闻南市有蜀姬，作茶粥卖之。廉事打破其器物。”^③京都洛阳已有蜀地老姬卖茶。晋元帝时，广陵地区“有老姥，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。市人竞买，自旦至暮，其器不减”^④。广陵在今江苏扬州一带。这说明两晋时期的南方地区，茶已在市场上售卖，民间茶的盛器有可能是带系的罐子或壶，老妇可独自持拿。

西晋著名文学家杜育的《荈赋》就是咏茶赋：“水则岷方之注，挹彼清流；器泽陶简，出自东隅；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刘。惟兹初成，沫沉华浮，焕如积雪，晔若春敷。”^⑤隅通瓿，东隅指位于东边的瓿窑，大致位于今天的浙江温州、永嘉一带，东汉时开始烧造青瓷，胎质比较细腻，釉色淡青，呈色偏白，透明度较好。青瓷的颜色很像一种缥，缥原是晋代一种淡青色的丝帛，借缥喻瓷，称为缥瓷，作茶器。缥瓷也常作酒具，西晋潘岳《笙赋》有描绘青瓷“披黄包以授甘，倾缥瓷以酌酺”^⑥之名句。

茶饮之初，饮茶器具与饮食器具尚未分开，经常混用。如陶孟也曾为茶具。晋代卢琳在《四王起事》中记载：“惠帝自荆还洛，有一人持瓦孟承茶，夜莫，上至，尊饮以为佳。”^⑦以“何不食肉糜”闻名的晋惠帝好歹是皇帝，用瓦孟承茶，可见当时茶具还未专用。后来茶具逐渐从食器中分化出来，首先出现了带托盘的青釉茶盏。青瓷茶盏有的与盏托配套使用，有的则连为一体，东汉常见是一盘搭四

① 赵逵夫主编：《历代赋评注·汉代卷·僮约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10年，第227页。

② （南朝陈）徐陵编，（清）吴兆宜注，程琰删补，穆克宏点校：《玉台新咏笺注》卷二《左思·娇女诗一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92-93页。

③ （清）严可均编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之《全晋文》卷五十二《傅咸·又教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1759页。

④ （北宋）吴淑撰注：《事类赋注》卷十七《饮食·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351页。

⑤ （清）严可均编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之《全晋文》卷八十九《杜育·荈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1978页。

⑥ 赵逵夫主编：《历代赋评注·魏晋卷·笙赋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10年，第409页。

⑦ （隋）虞世南编：《北堂书钞》卷第一百四十四《酒食部三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646页。

至六只耳盏，东晋出现一盏一托，南朝时成为风行一时的茶具。盏一般是直口微敛，深腹底部略鼓或斜弧壁，大平底，饼足；托盘为圆形敞口，浅腹，平底，饼足，有的中心下凹，有的内底中央起托圈，用来放置杯盏，通体施青釉。有的盏托与盏以釉相互粘边连成一体。此时茶盏的显著特点是多为饼足，底部露胎。江西吉安南朝齐墓中出土过一件纹样华美、造型别致的青瓷茶具，如图3-44，包括



图 3-44 南齐青瓷茶具（江西吉安博物馆藏）

茶盏和托盘两部分，茶盏口径15.5厘米，底径6.8厘米，高8.2厘米；托盘口径22.2厘米，底径10.2厘米，高4.3厘米。茶器周身施米黄色青釉，釉汁莹润，光洁素雅。茶盏外壁装饰有两层当时流行的仰莲瓣纹，托盘中央为凸起的圆圈，起承托作用。圈外饰两层莲瓣纹，与盏托相合可构成一个整体，设计巧妙，似傲然盛

开的莲花。南朝佛教盛行，莲花象征佛意，故器物常饰有莲花纹饰。茶具的兴起，为唐宋以后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我国在隋唐以前，汉代以后，已出土有专用茶具，但食具包括茶具、酒具在内，区分并不严格，在很长的时间内，两者共用。

东晋至南朝末期墓葬中，长江以南如南京、镇江、苏杭等地发掘出许多“鸡首壶”青瓷。考古学家从随葬器物组合、墓壁砖画、酒器类别及江南饮茶习俗等方面分析，认定“鸡首壶”是当时的茶具，是江南饮茶习俗的见证。六朝时，嗜茶人歿后，会有茶具随葬。《南齐书·武帝纪》中梁武帝遗诏有言：“灵上慎勿以牲为祭，唯设饼、茶饮、干饭、酒脯而已。天下贵贱，咸同此制。”^①说明当时已有以茶祭墓主的风气。魏晋六朝，士大夫尚清淡，佛教流行，兴起素食茶饮，鸡首壶发展为茶饮器具，墓葬的大量出土，反映了时人“事死如事生”“事亡如事存”^②的文化延续和社会意识。

①（南朝梁）萧子显撰：《南齐书》卷三《本纪第三·武帝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2年，第62页。

② 李蔚然著：《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89页。

东晋南朝，青瓷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，黑瓷也得到了发展，陶器、漆器逐渐衰落，其材质的饮食器具已较少见。南方，饮茶逐渐兴盛，茶具得到发展，并逐渐从饮食器中独立出来。金银玉石等器仍是上层社会的奢华器具。

第四节 北朝的饮食器具

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族拓跋部，原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，从事狩猎和畜牧业，逐水草而居，以捕猎肉食为主，在南迁并定都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过程中，逐渐受汉文化影响从事农业生产。三国两晋，战事不断，北方的制瓷业发展迟滞，不及南方。北魏时逐渐发展并汲取南方经验，烧制出北方特色的青瓷，成为北方瓷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。考古工作者在河北、河南、山西等地发掘出的北朝青瓷，其制作技法与南方青瓷有明显区别，具有粗壮挺拔、朴素浑厚的特点。除青瓷外，北齐还烧制出白瓷、黑瓷和彩瓷，成为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，标志着北方制瓷业的迅速发展。

一、陶瓷饮食器具

北朝早期的饮食器具多为陶器，中晚期后瓷器逐渐增多，有青瓷、黑瓷两种，以青瓷居多，种类有碗、杯、盘、高足盘、长颈瓶、盏、盏托、盂、四耳罐、双耳罐、钵、莲花尊等。黑瓷有碗、杯、盂等。相对南方细腻流畅的瓷器造型，北方则胎体厚重，粗犷豪放。北朝青瓷施玻璃质釉，比南方青瓷釉厚，光泽也强，但釉质透明度差，少数釉质清亮，呈黄绿色或灰绿色。北方器物，多数在肩部或中腹以上施釉，下方不施釉，任釉下流呈蜡泪状。瓷器的装饰，多用线刻、贴塑等技法饰以忍冬、莲瓣、联珠、禽鸟、兽头、神仙人物等，独具风格。北齐时出现了新兴的白瓷，釉层薄而滋润，呈乳白色，普遍泛青，显示出脱胎于青瓷的渊源关系，为隋唐时期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还有釉陶类器物，品种有碗、杯、盏、罐等，有单色釉，也有两彩釉陶。特别是釉下彩釉陶，色泽鲜明，花色较多，釉质莹润明亮，工艺精湛，从其陶胎、施釉方法及釉色组成看，与后来的唐三彩之间关系颇深。

庖厨中，烹制和存放食物的器类主要有釜、甑、瓮、盆、甗、罐、壶、盘等。

北朝的庖厨炊具沿袭汉晋，主要是灶、釜、甑。釜用于对食物进行烤、煮、煎等，形制一般是敞口，扁圆腹，圜底。小型釜或罐形釜可用来烧水。甑为敞口，器底有算孔，要蒸的食物放入甑内，套在釜上，釜下生火，以水蒸气炊熟。甑底的算有的直接与甑连为一体，有的则套在甑底。碗类器物腹体较深，底部收得很小，下带圆饼形足。

（一）陶瓷饮食器的主要品种

北朝陶瓷饮食器的主要品种有罐、尊和壶。

1. 罐。陶罐有大小之分，用来贮存食物、造酒、制醋、作酱等。罐、壶多用来制作和贮存酒、醋等液态和固态食物。《世说新语·尤悔》记载任城王“既中毒，太后索水救之；帝预敕左右毁瓶罐，太后徒跣趋井，无以汲，须臾遂卒”^①。罐有卷沿、平沿和盘口、窄口、直口之分，或泥质或夹砂灰陶或褐陶，均鼓腹，平底，个别的单侧有耳，或肩附三系、四系、六系等，外部饰网状暗纹、竖线暗纹、放射状暗纹或弦纹，还有具有北魏时代特征的忍冬纹、水波纹等。北朝晚期带系罐的中腹部多饰凸起的粗弦纹或陶纹一周，把罐的造型分为上、下两部分，下部不施釉，风格简朴，粗放饱满。此类罐的系用来穿绳以便提用或悬挂，以防鼠害及灰尘。还有一种特殊用途的罐，即在腹底部钻有小孔的灰陶罐，据《齐民要术·作酢法》所言用以为酒糟酢，“七日后，酢香熟，便下水令相淹渍。经宿，醕孔子下之”^②，类似带孔的罐，可用来酿酒或滤醋。

2. 尊。典型的贮酒器有青釉莲花尊。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，如图3-45所示，口径15.1厘米，底径18厘米，高54.4厘米，喇叭形口，长颈，丰肩，腹饱满，高足。莲瓣纹盖，肩部至底足装饰六层不同形态的莲瓣，有的莲瓣根部饰有模印菩提树叶。该莲花尊形体高大，造型古朴，气魄宏伟，繁缛华丽，通体施青釉，釉色青绿。该器物采用浅刻、深雕、模印、堆贴等多种装饰技法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，是北朝青瓷的代表性作品。莲花尊是南北朝时期的特殊产物，

①（南朝宋）刘义庆撰，（梁）刘孝标注，杨勇校笺：《世说新语校笺》下《尤悔第三十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805页。

②（北魏）贾思勰著，石声汉校释：《齐民要术今释》卷八《作酢法第七十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773页。

由于统治者崇尚佛教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，莲花尊不仅作为酒器存在，还是一种礼佛器物。南北朝时期的莲花纹样，空间立体感强烈，前期多保持青瓷质地，施彩釉较少，后期莲瓣纹样的出现和流行，丰富了釉色变化，造型言说着佛教故事，百态各异。

3. 壶。北朝晚期具有特色的酒器是鸡首壶和扁壶。鸡首壶多为酱褐釉瓷或青瓷，盘口，细长颈，鼓腹小底，颈部多饰弦纹，龙头柄，鸡首流，有的壶身上腹部饰凸雕覆莲，莲瓣丰厚，瓣尖上翘。扁壶出现得较晚，造型与装饰均仿具有波斯风格的银器，多为方唇，短颈，溜肩，肩部以下呈上窄下宽的扁圆形，两面腹部刻有西域风格的胡腾舞或戏狮，肩部有耳便于系绳背带。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北齐黄釉印花扁壶，如图3-46，高27.5厘米，口径5.7厘米，椭圆形口，短束颈，梨形腹，腹部扁平，高圈足。正背面模印相同纹饰，呈浅浮雕状。腹壁正中站立一胡人，左手持物似骨朵，身前两侧蹲坐两只狮子，狮子扭首向前。壶壁两侧模印象首，长鼻垂于底部。口部、足壁部分模印联珠纹莲瓣。此后黄釉、绿彩的运用为唐三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该器明显受外来文化影响，是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
东汉之后，瓷质扁壶数量增多，逐渐取代了陶质扁壶和铜质扁壶。南北朝至隋代的扁壶皆出土于北方地区，集中在华北，从出土器物的纹饰和纹样来看，与南朝的扁壶关联不大，联珠纹和凤鸟图极具异域色彩，也呈现出浓郁的鲜卑族特色。此时佛教已传至北方，忍冬纹和莲花纹等纹饰非常普遍。北朝及以前的扁壶



图 3-45 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（河北博物院藏）



图 3-46 北齐黄釉印花扁壶（山西博物院藏）